

毛泽东论文艺

萬家墨而
沒蒿萊不
有孔吟
此長心事
浩氣連廣宇
于無聲處
為雷霆

毛泽东论文艺

(增订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 新登字 002 号

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

MAO ZE DONG LON WEN Y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5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2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5\frac{5}{8}$ 插页 8

195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4年9月北京第2版

1983年7月北京第3版

1992年6月北京第4版

199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9,001—10,000

ISBN 7-02-001461-5/A·8

定价 4.60 元



毛泽东

毛主席在北京(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二年五月，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合影。



一九三九年五月和诗人萧三在延安杨家岭。



一九四九年七月，同周扬（左二）、沈雁冰（左三）、郭沫若（左四）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台上。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接見田漢、梅蘭芳、老舍（由左至右）等出席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

丁玲
欧阳山 二月念：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
在洗澡时睡意并一口气读完，并替中国
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所写作：《风庆
观！》合能社会所要求我讲一大话，竟为我
‘抖’，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你们的文章
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
天下午或傍晚挺请你们来我家教，不
知可不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

致丁玲、欧阳山（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為人民的音樂
冼星海
志氣長存
元清

为悼念冼星海题词(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毛泽东

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中國戲
曲研究
院

百花齊放
推陳出新

廖正興

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一九五一年）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白石先生

承贈著天國廣鑑畫軸

業已收到，甚為感荷，並

向為創作，緣石畫，亦非獨

得，生胡佩仙，康時，鼓動，

博，平，白，齋，圖，松，房，諸，

謝，意，此，致，

九月五日

致齊白石（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

落石與孤磬
清月共秋水
共長天一色
九月廿七日

书写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句手迹

出版说明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现将《毛泽东论文艺》（一九八三年第三版）一书加以增补、修订，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核批准，重新出版。

增订本共收入自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文稿六十五篇，分为两辑。第一辑选编毛泽东有关文艺工作的论述、讲演、批示、电报、题词，共三十一篇，十篇是原版中已收的，二十一篇是新增补的；第二辑选编毛泽东给文艺界人士和关于文艺问题的书信，共三十四封，除原版已收的一篇外，其余都是新增补的。每辑分别按年代顺序编排。原版中有几篇论述文化、理论工作的文稿，因为没有直接论及文艺工作，这一版没有收入。

增订本中的文稿，凡选自《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九八六年新编本、一九六五年甲种本）、《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九八三年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一九八三年版）的，一般都采用上述各书中原有的题目、题解和注释，个别题目、题解和注释，为求得体

例的一致，由本书编者略作调整。凡选自《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或在本书中第一次正式发表的，由本书编者写了题解和注释；原来没有题目的，由本书编者拟了题目。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五月

目 录

第 一 辑

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演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3)

神话与现实(一九三七年八月) (5)

论鲁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7)

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 (11)

关于接待抗战文艺工作团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 (13)

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

(一九三九年五月) (14)

为刘岷题词(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15)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九四〇年一月) (16)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五月) (34)

《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日） （69）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73）

要使人民离开愚昧状态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76）

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77）

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79）

为悼念冼星海题词（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81）

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的贺电（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82）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

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 （84）

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85）

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一九五一年） （86）

歌颂什么、反对什么（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87）

《合作社的带头人陈学孟》一文按语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89）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90）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101）

片面性问题(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108)
“放”还是“收”?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111)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文学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116)
关于纠正对待知识分子宁“左”勿右	
偏向的批示(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18)
关于“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119)
关于画裸体模特儿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120)
在关于使用模特儿情况来信上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	(121)
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122)

第 二 辑

致何香凝(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125)
致刘雪苇(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127)
致萧三(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	(128)
致周文(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129)
致萧三(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130)
致刘雪苇(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	(131)
致萧军(一九四一年八月二日)	(132)
致萧军(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	(133)

致欧阳山(一九四二年四月九日)·····	(134)
致欧阳山、草明(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	(135)
致欧阳山、草明(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	(137)
致罗烽(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	(138)
致欧阳山尊、朱丹、成荫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39)
致郭沫若(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	(141)
致杨绍萱、齐燕铭(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	(142)
致周扬(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	(144)
致李鼎铭(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146)
致胡乔木(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148)
致丁玲、欧阳山(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149)
致郭沫若(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50)
致柳亚子(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52)
致沈雁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53)
致萧三(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154)
致柳亚子(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	(156)
致柳亚子(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158)
致毛岸英(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160)
致齐白石(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	(161)
致廖静文(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162)
致臧克家等(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163)
致袁水拍(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164)
致刘少奇(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	(166)

致周恩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168)
致陈毅(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169)
致刘大杰(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	(172)

第一辑

在中国文艺协会成立 大会上的讲演*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因为现在中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抗日战线，一条是内战。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首先我们就要停止内战。但现在有人不愿停止内战，反而来进攻抗日主力的人民红军，

* 这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红色中华》报《红中副刊》第一期上报道的讲演略词，开头原来还有一省略号。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为了联络各地的文艺团体、各方面的文艺家，以及一切对文艺有兴趣者，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动新的文艺工作，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丁玲、成仿吾、李伯钊等三十四人倡议组成文艺工作者协会，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保安县（现名志丹县）召开成立大会。由毛泽东提议、全体会员通过，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

要消灭抗日的领导者和核心的苏维埃，要消灭一切抗日力量，抗日的文艺也要消灭。所以我们要抗日我们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所以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不管在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神 话 与 现 实*

(一九三七年八月)

所谓矛盾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说,我们所说的矛盾乃是现实的矛盾,具体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转化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神话中的许多变化,例如《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1〕},《淮南子》中所说的“羿射九日”^{〔2〕},《西游记》中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3〕}和《聊斋志异》^{〔4〕}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故事等等,这种神话中所说的矛盾的互相变化,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5〕}这种神话中的(还有童话中的)千变万化的故事,虽然因为它们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6〕}(马克思),但神话并不是根据具体的矛盾之一定的条件而构成的,所

* 节选自《矛盾论》,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下同)第一卷第330—331页。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以它们并不是现实之科学的反映。这就是说，神话或童话中矛盾构成的诸方面，并不是具体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注 释

〔1〕《山海经》是一部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其中记载了不少远古的神话传说。夸父是《山海经·海外北经》上记载的一个神人。据说：“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2〕羿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英雄，“射日”是关于他善射的著名故事。据西汉淮南王刘安（公元前二世纪人）及其门客所著《淮南子》一书说：“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猼訑、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猼訑。……万民皆喜。”东汉著作家王逸（公元二世纪人）关于屈原诗篇《天问》的注释说：“淮南言，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尧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留其一曰。”

〔3〕《西游记》是明代作家吴承恩著的一部神话小说。孙悟空是书中的主角。他是一个神猴，有七十二变的法术，能够随意变成各式各样的鸟兽虫鱼草木器物或者人形。

〔4〕《聊斋志异》是清代文学家蒲松龄著的短篇小说集，大部分是叙述神仙狐鬼的故事。

〔5〕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3页）。

〔6〕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4页）。

论 鲁 迅^{〔1〕}*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

同志们：

今天我们陕北公学^{〔2〕}主要的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的任务。当着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这种先锋分子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他们是不谋私利的，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他们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往直前；他们不是狂妄分子，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他们在革命的道路上起着向导的作用。目前的战局只是单纯政府与军队的抗战，没有广大的人民参加，这是绝对没有最后胜利的保障的。我们现在需要造就一大批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到底的先锋队，要他们去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来完成这历史的任务。首先全国的广大的先锋队要赶紧组织起来。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最彻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锋队。我们要为完

* 这是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据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印。

成这一任务而苦战到底。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动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

鲁迅是从压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组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8〕}，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地准确，那样地清楚。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孔夫子⁽⁴⁾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⁵⁾、俄国的普列汉诺夫⁽⁶⁾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政人伟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看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⁷⁾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他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

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注 释

〔1〕 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浙江绍兴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其著译收入《鲁迅全集》和《鲁迅译文集》。

〔2〕 陕北公学,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延安成立,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培养干部的学校。

〔3〕 参见《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86—589页)。

〔4〕 孔夫子,即孔子。春秋后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自汉武帝以后,孔子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尊为“圣人”。

〔5〕 考茨基(一八五四——一九三八),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领袖和理论家之一。

〔6〕 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领袖之一。

〔7〕 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281页)。

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 指导方向*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

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1〕}。有些亭子间的人以为“老子是天下第一，至少是天下第二”；山顶上的人也有摆老粗架子的，动不动，“老子二万五千里”。

现在应当不以那为满足——过去的东西，可以认为是准备时期的东西。应该把自大主义除去一点。

组织十年来的文化成果，训练起万千的文化干部，送到全国各战线上去工作，这是很必要的……

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

* 这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的一部分，刊登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三十日《新中华报》第四三二期上。据提供这份记录的何仲平在报上说明，这段话经过“毛泽东先生的亲笔订正”。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注 释

〔1〕 亭子间的人，指从上海等地来到边区的文化人。山顶上的人，指来自井冈山等革命老根据地的文化人。好吃，指内容切实、丰富。好看，指艺术形式。

关于接待抗战文艺 工作团的电报*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

各政治部：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派抗战文艺工作团一组计五人，由刘白羽^{〔1〕}率领，随同美国参赞卡尔逊，经榆林、晋西北赴战区各地考察，搜集材料，建立通讯网。到希搜洽，并予以帮助。

毛、谭^{〔2〕}

皓^{〔3〕}

注 释

〔1〕 刘白羽，一九一六年生，北京人，作家。

〔2〕 谭，即谭政（一九〇七——一九八八），湖南湘乡人。一九三八年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3〕 皓，即指十九日。电报中常以诗词韵目代日。“皓”韵在第十九组，即代指十九日。

*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为鲁迅艺术学院周年纪念题词*

(一九三九年五月)

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

* 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鲁迅艺术学院(一九四〇年改为鲁迅艺术文学院)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在延安正式成立。周年纪念大会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十日举行。毛泽东、朱德、张闻天、刘少奇、陈云、李富春等出席纪念大会,并为鲁艺题了词。毛泽东的题词参见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日报》“延安通讯”专栏方然文章《延安底文艺工作》。该文还提到毛泽东给“战地文化资料展览会”的题词:“发展抗日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但未说明题词时间。

为刘岷⁽¹⁾题词*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我不懂木刻的道理，但我喜欢看木刻。刘岷同志来边区时间不久，已有了许多作品，希望继续努力，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艺术而奋斗。

毛 泽 东

注 释

(1) 刘岷(一九一五——一九九一)，河南兰考人，木刻家。曾在鲁迅艺术学院教授木刻。

* 见《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25页。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一九四〇年一月)

——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上面,我们说明了中国政治在新时期中的历史特点,说明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问题。下面,我们就可以进到文化问题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西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

* 这是《新民主主义论》的最后五节,即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4—709页。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

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

如我们在第三节中已经提过的话，中国自从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以来，中国社会就逐渐改变了性质，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了，变成了半封建社会，虽然封建经济还是占优势。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对于封建经济说来，它是新经济。同这种资本主义新经济同时发生和发展着的新政治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而在观念形态上作为这种新的经济力量和新的政治力量之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东西，就是新文化。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

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它们是反对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的。这些旧东西是由两部分合成的，一部分是中国自己的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另一部分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以后者为盟主。所有这些，都是坏东西，都是应该彻底破坏的。中国社会的新旧斗争，就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新旧斗争，即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种斗争的时间，从鸦片战争算起，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从辛亥革命算起，也有

了差不多三十年了。

但是如前所说，革命亦有新旧之分，在某一历史时期是新的东西，在另一历史时期就变为旧的了。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特点。新民主主义——后二十年的特点。这种区别，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上也是如此。

在文化上如何表现这种区别呢？这就是我们要在下面说明的问题。

一二 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在“五四”以前，学校与科举之争^{〔1〕}，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两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

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五四”以后则不然。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五四运动是在一九一九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是在一九二一年，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面貌之时，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是非常之显然的。由于中国败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个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

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在“五四”以后，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就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至于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

文化。

一三 四个时期

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

这种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二十年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的两年，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六年，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十年，第四个时期是一九三七年到现在的三年。

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时期中以五四运动为主要的标志。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

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2]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3]和北伐战争。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右翼，到了第二个时期，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第二个时期，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继续了并发展了五四运动时三个阶级的统一战线，吸引了农民阶级加入，并且在政治上形成了这个各阶级

的统一战线，这就是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和教育界、学术界、青年界没有多大联系的，因为它没有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提出反封建社会制度和反封建文化思想的口号。在这以前，它是旧三民主义，这种三民主义是被人们看成为一部分人为了夺取政府权力，即是说为了做官，而临时应用的旗帜，看成为纯粹政治活动的旗帜。在这以后，出现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由于国共两党的合作，由于两党革命党员的努力，这种新三民主义便被推广到了全中国，推广到了一部分教育界、学术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之中。这完全是因为原来的三民主义发展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之故；没有这一发展，三民主义思想的传播是不可能的。

在这一时期中，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成了国共两党和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两个主义结成了统一战线。以阶级论，则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时，以共产党的《向导周报》〔4〕，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5〕及各地报纸为阵地，曾经共同宣传了反帝国主义的主张，共同反对了尊孔读经的封建教育，共同反对了封建古

装的旧文学和文言文，提倡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学和白话文。在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中，曾经在中国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改造了中国的军队。在千百万农民群众中，提出了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掀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由于这些，再由于苏联的援助，就取得了北伐的胜利。但是大资产阶级一经爬上了政权，就立即结束了这次革命，转入了新的政治局面。

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因为在前一时期的末期，革命营垒中发生了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剩下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所以这时候，中国革命就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而由中国共产党单独地领导群众进行这个革命。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面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人农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面，

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反革命“围剿”的消极的结果，则是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全国人民至今还是非常痛恨那十年反共的最大原因。

这一时期的斗争，在革命方西，是坚持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在反革命方面，则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下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腰斩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腰斩了他的新三民主义，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的灾难。

第四个时期就是现在的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的曲线运动中，又来了一次四个阶级的统一战线，但是范围更放大了，上层阶级包括了很多统治者，中层阶级包括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下层阶级包括了一切无产者，全国各阶层都成了盟员，坚决地反抗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是在武汉失陷以前。这时全国各方面是欣欣向荣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趋势，文化上有较普遍的动员。武汉失陷以后，为第二阶段，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大

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投降了敌人，其另一部分也想早日结束抗战。在文化方面，反映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叶青、张君勱等人的反动和言论出版的不自由。

为了克服这种危机，必须同一切反抗战、反团结、反进步的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不击破这些反动思想，抗战的胜利是无望的。这一斗争的前途如何？这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问题。依据国内国际条件，不论抗战路程上有多少困难，中国人民总是要胜利的。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假如再有二十年的工夫，中国的进步将到何地，不是可以想得到的吗？一切内外黑暗势力的猖獗，造成了民族的灾难；但是这种猖獗，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表示了人民大众逐渐接近了胜利。这在中国是如此，在整个东方也是如此，在世界也是如此。

一四 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

一切新的东西都是从艰苦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新文化也是这样，二十年中有三个曲折，走了一个“之”字，一切好的坏的东西都考验出来了。

资产阶级顽固派，在文化问题上，和他们在政权问题上一样，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知道中国新时期的历史特点，他们不承认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他们的出发点

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一部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6〕}（我说的是一部分），他们曾经实际赞助过国民党政府的文化“剿共”，现在似乎又在赞助什么“限共”、“溶共”政策。他们不愿工农在政治上抬头，也不愿工农在文化上抬头。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这条文化专制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它同政权问题一样，没有国内国际的条件。因此，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也还是“收起”为妙。

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但整个的国民文化，现在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但是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说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因为在现阶段革命的基本任务主要地是反对外国的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封建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就国民文化领域来说，如果以为现在的整个国民文化就是或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这是不对的。这是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宣传，当作了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把用共产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去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当作了中国民主革命阶段上整个的国民教育和国

民文化的方针。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这种一部分，虽则包含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但是就整个国民文化来说，还不是完全以社会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而是以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资格去参加的。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在现阶段是领导人民大众去作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所以现在整个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还是新民主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

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但是我们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

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把二者混为一谈，无疑是很不适当的。

由此可知，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

一五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帝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文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独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量西化”〔7〕的主张，乃是

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或宗教教义。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

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看，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8〕，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而这种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群众的。因此，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为这此目的，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教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

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注 释

〔1〕“学校”指当时效法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制度。“科举”指中国原有的封建考试制度。十九世纪末，中国提倡“维新”的知识分子主张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封建顽固派竭力反对这种主张。

〔2〕一九一九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至六月初转入一个新的阶段，以六月三日北京学生反抗军警镇压，集会讲演开始，由学生的罢课，发展到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各地的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五四运动至此遂成为有无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运动。

〔3〕指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五月十五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伤工人十余人。二十九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八人。五月三十日，上海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一百余名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六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4〕《向导》周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武汉终刊。

〔5〕 上海《民国日报》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创刊，国民党一大后正式成为国民党的机关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曾经宣传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主张。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后，曾被西山会议派把持，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报纸。一九四七年停刊。

〔6〕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一部分欧美派文化人是指以胡适等为代表的一些人物。

〔7〕 所谓“全盘西化”，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学者的主张。他们主张中国一切东西都要完全模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8〕 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五月)

引 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1〕}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

* 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7—879页。

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

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指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

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

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晌。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

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结 论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

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差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一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

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3〕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

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4]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述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

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看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他们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予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

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

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5〕}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

于占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8〕}。

人类的社会生活里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里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来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西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7〕，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8〕，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

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离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

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

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9〕}，那来，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

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0〕。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定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

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

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西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

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被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

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

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吗？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

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教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鲁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

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去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考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

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西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

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11〕}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来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12〕}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宣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

《毁灭》^{〔13〕}，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道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4〕}，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注 释

〔1〕 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2〕 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3〕 梁实秋（一九〇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95—212页）

〔4〕 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

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

〔5〕 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

〔6〕 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7〕 “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

〔8〕 “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国语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

〔9〕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10〕 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11〕 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置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

〔12〕 指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战争时期，人们习惯称未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而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而南部和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为“大后方”。

〔13〕 法捷耶夫（一九〇一——一九五六），苏联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内容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苏联远东滨海边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曾由鲁迅译为汉文。

〔14〕 见鲁迅《集外集·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日)

(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¹⁾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江丰⁽²⁾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张庚⁽³⁾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⁴⁾同志:以大众化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范文澜⁽⁵⁾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邓发⁽⁶⁾同志:以工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彭真⁽⁷⁾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5,000字。

王震之⁽⁸⁾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冯文彬⁽⁹⁾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

* 这个征稿办法是毛泽东为延安《解放日报》拟订的,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01—103页。

12,000字。

艾思奇^[10]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陈伯达^[11]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周扬^[12]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吕骥^[13]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蔡畅^[14]同志：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董纯才^[15]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吴老^[16]：以语艾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以上共149,000字。

(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政，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者作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注 释

〔1〕 荒煤,即陈荒煤,一九一三年生,湖北襄阳人,文艺评论家。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后,在鲁艺戏剧系、文学系任教。

〔2〕 江丰(一九一〇——一九八二),上海人,艺术理论家、艺术教育家、木刻家。一九三八年到延安后,曾任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等职。

〔3〕 张庚,一九一一年生,湖南长沙人,戏剧理论家。一九三八年初到延安,曾任鲁艺戏剧系主任。

〔4〕 柯仲平(一九〇二——一九六四),云南广南县人,诗人。一九三七年到延安,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任、主任等职。

〔5〕 范文澜(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浙江绍兴人,历史学家。一九四〇年一月到延安后,曾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

〔6〕 邓发(一九〇六——一九四六),广东云浮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

〔7〕 彭真,一九〇二年生,山西曲沃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副校长等职。

〔8〕 王震之(一九一五——一九五八),河北定县人,剧作家。当时任鲁艺戏剧系教员、副主任等职。

〔9〕 冯文彬,一九一〇年生,浙江诸暨人。曾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中共陕西米脂县委书记等职。

〔10〕 艾思奇(一九一〇——一九六六),云南腾冲人,哲学家。一九三七年十月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

〔11〕 陈伯达(一九〇四——一九八九),福建惠安人。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

〔12〕 周扬(一九〇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

〔13〕 吕驥,一九〇九年生,湖南湘潭人,作曲家、音乐评论家。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后任音乐系主任,后又兼任教务主任。

〔14〕 蔡畅(一九〇〇——一九九〇),湖南湘乡人。抗战时期曾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

〔15〕 董纯才(一九〇五——一九九〇),湖北大冶人,教育家。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后,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审科科长、边区师范学校副校

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国民教育科副科长等职。

〔16〕 吴老，即吴玉章（一八七八——一九六六），四川荣县人。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

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和希特勒一样，快要灭亡了。但是还须我们继续努力，才能最后地消灭它。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解放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遗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面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因此，在教

*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1—1013页。

育工作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规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村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利用旧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1〕}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地加以改造。在医药方面,更是如此。陕甘宁边区的人、畜死亡率都很高,许多人民还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之下,仅仅依靠新医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新医当然比旧医高明,但是新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旧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

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欲速则不达”〔2〕，这不是说不要速，而是说不要犯盲动主义，盲动主义是必然要失败的。在一切工作中都是如此；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尤其是如此。达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注 释

〔1〕 秦腔，又名梆子腔，是流行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戏曲。

〔2〕 见《论语·子路》。

要使人民离开愚昧状态*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宝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他们中有许多人从事军事、政治、经济工作，另有许多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卫生工作。所有这些人员，都应该被重视。今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会议所指出的方向，各地都可以适用。专制主义者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状态与不卫生的状态。各地政府与党组织，均应将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项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

* 这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的一段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19页。

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

* 这是《论联合政府》“我们的具体纲领”一节中的一段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77—1078页。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我这样说，当然不是忽视其他约占人口九千万的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重要性，尤其不是忽视在政治上最觉悟因而具有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资格的工人阶级，这是不应该发生误会的。

文化、教育、知识分子问题*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灾难中，包括着民族文化的灾难。特别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进步的文化人和教育家，所受灾难，更为深重。为着扫除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他们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因而知识分子问题就特别显得重要。而在过去半世纪的人民解放斗争，特别是五四运动⁽¹⁾以来的斗争中，在八年抗日战争中，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在今后的斗争中，他们将起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后

* 这是《论联合政府》“我们的具体纲领”一节的第八小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82—1083页。

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

从百分之八十的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

对于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们的态度,是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他们,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为人民服务。

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注 释

〔1〕 见本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注释〔1〕。

为悼念冼星海^{〔1〕}题词*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

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毛 泽 东

注 释

〔1〕 冼星海(一九〇五——一九四五),广东番禺人,作曲家。主要作品有《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

* 见《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86页。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讲边区大生产运动的时候,提到“《开荒歌》是那时唱出来的,《生产大合唱》也是那时产生的。”

中共中央给中华全国文学艺术 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贺电*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诸位代表们：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代表大会现在在北平召开，正值人民革命取得了基本胜利的时候。自从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1〕}以来已经三十年了，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大会还是第一次举行，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人民革命的胜利，人民政权的建立，是决定一切的。如果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人民政权的建立，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团结，进步的文学艺术工作就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获得自己的发展。我们中国是处在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情况中。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

* 这是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人民日报》刊载的中共中央贺电，毛泽东在审定这封贺电时对原稿作了大量修改。

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现当你们的会议开幕之际，特向你们致贺，并祝你们成功。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

注 释

〔1〕 参见本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注释〔1〕。

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九年七月六日)

同志们，今天我来欢迎你们。你们开的这样的大会是很好的大会，是革命需要的大会，是全国人民所希望的大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再讲一声，我们欢迎你们。

* 这是一九四九年七月七日《人民日报》对讲话内容的报道。题目为本
书编者所拟。

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毛 泽 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 见《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107页。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在给《人民文学》主编沈雁冰的复信中，毛泽东写道：“雁冰兄：示悉。写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写，或请沫若兄写，不宜要我写。”

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

(一九五一年)

中国戏曲研究院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

毛 泽 东

* 根据手稿刊印。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特刊》发表了毛泽东等为延安平剧研究院成立题的词,毛泽东的题词是:“推陈出新”。

歌颂什么、反对什么*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1]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2]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 这是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时加写的一段文字。

注 释

〔1〕 武训(一八三八——一八九六)，原名武七。清末山东堂邑(今聊城西)人。以“兴乞兴学”而著名，通过乞讨、放高利贷等，买地举办“义学”，得到封建统治者表彰，被封为“义学正”。

〔2〕 鸦片战争是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资本主义的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从十八世纪末期起，英国把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一八三八年底清政府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州禁烟。一八三九年六月林则徐下令当众销毁从英、美等国不法商人手中缴获的鸦片二百三十多万斤。一八四〇年，英国借口保护通商，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在战争中动摇妥协，只有部分军队和人民群众奋起抵抗侵略者。英军除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骚扰并入侵外，又攻占吴淞，闯进长江，直逼南京，迫使清政府在一八四二年八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合作社的带头人陈学孟》 一文按语*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这里又有一个陈学孟。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下乡去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人们也是看得多写得少。

* 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共写了一百零四篇按语。这是第四十二篇。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中册）第544页。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1〕},打到三八线^{〔2〕}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

* 这是毛泽东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时的谈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下册第745—753页。

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西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灵，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象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中国的民族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唢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

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3]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4]，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

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应该学外国的近代的来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理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5]。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些。

手工艺品的事情，请美术家请不到。对中国民间艺术看不起，这是个兴趣问题。应该逐步地引起他们的兴趣。可能一时说不通，要长期说服。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原故。教条主义看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道。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快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

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⁶⁾的文章，今天用不着。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⁷⁾。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

只有八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二十多年仗，有军队，有二百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8〕}，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

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音乐的基本原理各国是一样的，但运用起来不同，表现形式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写游记，我们一起去游香山，游的地方虽然一样，但是每个人写出来的就不一样。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

学到。要重视中国的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是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9]中的第二门。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西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魂灵》，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

不好的。外国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象西太后〔10〕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音乐，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11〕。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2〕。“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

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是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西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西，吸取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份。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洋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注 释

〔1〕 抗美援朝，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侵入朝鲜，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两方原来的临时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2〕 三八线，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时，美、苏两国商定在朝鲜国土上以北纬38°线作为两国接受日军投降的临时分界线，分界线以北为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这条线通称三八线。朝鲜战争爆发时，朝鲜人民已在

这条线以北地区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条线以南地区还在美帝国主义扶植的李承晚傀儡集团统治下。

〔3〕 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的国际联合组织，一八八九年七月在巴黎成立。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第二国际初期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立场。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迅速滋长，以伯恩斯坦为首的右派和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

〔4〕 江亢虎（一八八三——一九五四），江西弋阳人。早年游历日本和欧洲，受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影响。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后，标榜社会主义，在上海创办中国社会党。一九一三年，该党被解散。一九二四年，他为了投靠北洋军阀，重新组织中国社会党，次年又把该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一九二七年，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时，他不得不把他的党解散。抗日战争时期，他投身敌伪政府，堕落为汉奸。

〔5〕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6〕 桐城派是古文中的一个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是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的方苞、刘大櫆、姚鼐。由于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后人把他们和他们这一派的人称为桐城派。这一派的作家并不都是桐城人。

〔7〕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考虑对资本家实行“赎买”的政策。例如他在一九一八年五月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说：“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做到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就是说，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即对那些既不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而继续以投机、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加以无情惩治；另一方面与文明的资本家，即与那些肯接受‘国家资本主义’，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聪明练达地组织真正用产品供应千百万人民的极大的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9—550页）由于发生了国内战争，由于资本家阶级一般地站在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立场上，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设想没有能行得通。

〔8〕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

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一般用两句，说破题目的要义。“承题”一股用三句至五句，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概说全体，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这四个段落才是正式的议论，中股为全篇文字的重心。在这四个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也称为八比。

〔9〕 孔子的“六门课程”就是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10〕 西太后即叶赫那拉氏（一八三五——一九〇八），清朝咸丰皇帝的妃子，一八六一年其子载淳（同治皇帝）即位后，被尊为慈禧太后，因住在西宫，所以又称西太后。她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清末顽固势力的总代表，对内实行残酷统治，对外妥协投降同时又盲目地排外。一八九八年，她镇压了主张向西方学习的戊戌维新运动。

〔11〕 隋朝的九部乐是：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据《隋书》卷十五，音乐下）。唐朝十部乐是：燕乐、清商、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据《新唐书》卷二十一，礼乐十一）。其中，龟兹、康国、安国、疏勒、高昌都属于西域，高丽是当时朝鲜的国名，天竺即印度。

〔12〕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清朝末年洋务派官僚提出的主张。所谓“中学为体”，就是要以儒家的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作为立国的不能改变的根本原则。所谓“西学为用”，就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科学技术，作为维持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一种手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呢?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断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

* 这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八节“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论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部分。见《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下册第783—789页。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1],达尔文的进化论^[2],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

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形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

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

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

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那末，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

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不赞成这些标准的人们仍然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来辩论。但是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为了鉴别科学论点的正确或者错误，艺术作品的艺术水准如何，当然还需要一些各自的标准。但是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难道有什么有益的科学艺术活动会违反这几条政治标准的吗？

以上所说的观点，都是从我国的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各不相同。因此，我们并不认为，它们必须或者应当采取中国的做法。

注 释

〔1〕 哥白尼（一四七三——一五四三），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一书中，证明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和其他行星一起，围绕着太阳旋转，推翻丁约两千年来地球不动的学说。

〔2〕 达尔文（一八〇九——一八八二），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明了生物的演变和人类的起源。

片面性问题*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片面性问题。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看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当

*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第六点。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九六五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甲种本）第373—376页。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然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评，要帮助他们。

有人说，既然要整风，要大家提意见，就必然要有片面性，提出克服片面性，好象就是不让人讲话。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要求所有的人都不带一点片面性，这是困难的。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发表意见，有时候就难免带上一些片面性。但是，可不可以要求人们逐步地克服片面性，要求看问题比较全面一些？我看应该这样要求。如果不是这样，不要求一天一天地、一年一年地有较多的人采用比较全面地看问题的方法，那末，我们就停滞了，我们就是肯定片面性了，就是同整风的要求背道而驰了。所谓片面性，就是违反辩证法。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我们现在有些文章，神气十足，但是没有货色，不会分析问题，讲不出道理，没有说服力。这种文章应该逐渐减少。当着自己写文章的时候，不要老是想“我多么高明”，而要采取和读者处于完全平等地位的态度。你参加革命的时间虽然长，讲了错话，人家还是要驳。你的架子摆得越大，人家越是不理你那一套，你的文章人家就越不爱看。我们应该老老实实地办事，对事物有分析，写文章有说服力，不要靠装腔作势来吓人。

有人说，发长篇大论可以避免片面性，写短篇的杂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杂文是不是一定会带片面性？我在上面讲了，片面性往往是难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问题都必须很全面，这样就会阻碍批评的发

展。但是，我们还要求努力做到看问题比较全面，不管长文也好，短文也好，杂文包括在内，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来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

不敢写文章怎么办？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我们的敌权是人民民主政权，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保证。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批评，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批评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放”还是“收”？*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

“放”还是“收”？这是个方针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同志们在讨论中间是不赞成收的，我看这个意见很对。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

*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第七点，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一九六五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甲种本）第376—379页。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方针。

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象我在上面所说的，我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是愿意进步的，愿意改造的，是可以改造的。在这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有很大作用。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面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不会说服怎么办？这就要学习。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

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人们历来不是讲真善美吗？真善美的反面是假恶丑。没有假恶丑就没有真善美。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任何对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

我们主张放的方针，现在还是放得不够，不是放得过多。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错误的东西总会有的，并不可怕。最近一个对期，有一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面，反对错误的东面，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面。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

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长时间以来，人们对于教条主义作过很多批判。这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来而，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

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文学*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1〕}，孟子的民贵君轻^{〔2〕}，荀子^{〔3〕}的人定胜天，屈原^{〔4〕}的批判君恶，司马迁^{〔5〕}的颂扬反抗，王充^{〔6〕}、范缜^{〔7〕}、柳宗元^{〔8〕}、张载^{〔9〕}、王夫之^{〔10〕}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11〕}、施耐庵^{〔12〕}、吴承恩^{〔13〕}、曹雪芹^{〔14〕}的民主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15〕}，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注 释

〔1〕 孔子，参见本书《论鲁迅》注〔4〕。“有教无类”，语出《论语·卫灵公》。

〔2〕 孟子，被后世统治者尊为“亚圣”。“民贵君轻”，语出《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3〕 荀子，战国末期思想家、教育家。著有《荀子》。

〔4〕 屈原，战国时期楚国诗人。现存作品均收入西汉刘向辑纂的《楚辞》中。

* 这是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在审阅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时加写的一段话。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陆定一的这篇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七期上。

〔5〕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著有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6〕 王充，东汉哲学家。著有《论衡》。

〔7〕 范缜，南朝齐梁时期思想家。著有《神灭论》。

〔8〕 柳宗元，唐代文学家、哲学家。作品收入《柳河东集》。

〔9〕 张载，北宋哲学家。著作编为《张子全书》。

〔10〕 王夫之，明末清初思想家。著作编入《船山遗书》。

〔11〕 关汉卿，元代戏曲家，元杂剧奠基人。创作了《窦娥冤》等大量作品。

〔12〕 施耐庵，元末明初小说家。《水浒传》的作者（一说与罗贯中合作）。

〔13〕 吴承恩，明代小说家。《西游记》的作者。

〔14〕 曹雪芹，清代小说家。《红楼梦》的作者。

〔15〕 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 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中华民国的创始人。遗著编为《孙中山全集》。

关于纠正对待知识分子 宁“左”勿右偏向的批示*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陆定一^{〔1〕}同志：

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你看如何？文学艺术团体、报社、杂志社和出版机关的党委、党支，也应发去，也应讨论一次。请酌定。

毛 泽 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注 释

〔1〕 陆定一，一九〇六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 中共中央宣传部内部刊物登载《清华大学物理教研组对待教师宁“左”勿右》一文，反映该组党员中存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高级知识分子都是从根本上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等错误认识。毛泽东阅后作了以上批示。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4页。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关于“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的批示*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定一^{〔1〕}同志：

此件请一阅。信是写得好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但应采取征求群众意见的方法，在教师、学生中先行讨论，收集意见。

毛 泽 东

九月二十七日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此信表示一派人的意见，可能有许多人不赞成。

注 释

〔1〕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 中央音乐学院一个学生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写给毛泽东一封信，对实行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等提出了意见。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写了这个批示。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98页。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关于画裸体模特儿问题的批示*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1〕}同志：

此事^{〔2〕}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 Model^{〔3〕}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 泽 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注 释

〔1〕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恩来，即周恩来。

少奇，即刘少奇。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2〕 指禁止使用模特儿的事。

〔3〕 Model，英语单词，汉语一译“模特儿”。

*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闻立鹏、王式廓、李化吉写信，反映废除模特儿制以后教学活动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认为真人（模特儿）写生是美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法，至少在油画专业和雕塑专业应该有一定比例的人体习作。毛泽东在这封信上作了这个批示。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5页。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在关于使用模特儿 情况来信上的批示*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

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1〕}素描的道路，而不走齐白石^{〔2〕}的道路。

注 释

〔1〕 徐悲鸿(一八九五——一九五三)，江苏宜兴人，画家。建国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2〕 齐白石(一八六四——一九五七)，湖南湘潭人，画家。建国后，曾任北京中国画院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

*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张际春(原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给毛泽东并党中央写信，说明他对使用裸体模特儿的意见和对毛泽东上一次批示的讨论情况。毛泽东阅后写了这个批语。根据手稿刊印。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毛 泽 东

* 长春电影制片厂张天民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八日分别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信,对江青和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故事影片《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的“十条意见”提出不同的看法,并建议重新上演。毛泽东调看了影片,然后写了这个批语。根据手稿刊印。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第 二 辑

致 何 香 凝^{〔1〕}*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香凝先生：

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2〕}，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3〕}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看了柳亚子^{〔4〕}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象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敬祝

健康！

毛 泽 东 上

六月二十五日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06—107页。

注 释

〔1〕 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广东南海人,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画家,廖仲恺夫人。早年加入同盟会,随同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建国后,曾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主席。

〔2〕 《双清词草》,是廖仲恺的诗词集,一九二八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影印出版。

〔3〕 承志,即廖承志(一九〇八——一九八三),广东惠阳人,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4〕 柳亚子,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经常为何香凝组织的“寒之友社”成员题画,共同表达胸中的愤慨。详见本书《致柳亚子》(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文注释〔1〕。

致刘雪苇^{〔1〕}*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收到了，谢谢！

我已看了“座谈会纪录”，很欢喜。如有新的，请续寄我。

毛 泽 东

五月二十八日

注 释

〔1〕 刘雪苇，又名孙雪苇，一九一二年生，贵州郎岱（今属六盘水市）人。

* 刘雪苇写信给毛泽东，说：“汉口《七月》半月刊主编胡风先生寄来第三集第一期《七月》，嘱分赠一本给你，现特转上，祈查收。”毛即回了这封信。根据手稿刊印。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致 萧 三^{〔1〕}*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

子暉同志：

（一）大作^{〔2〕}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

（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

（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

敬复。

毛 泽 东

六月十七日

注 释

〔1〕 萧三（一八九六——一九八三），原名萧子暉，湖南湘乡人，诗人。当时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

〔2〕 指萧三写的一本诗稿。其中一部分诗后来收入他的诗集《和平之路》和《萧三诗选》。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5—156页。

致 周 文^{〔1〕}*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

周文同志：

群众报^{〔2〕}及《大众习作》^{〔3〕}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大众习作》封面写得不好，请改换一个如何？

敬礼！

毛 泽 东

十一月三十日

注 释

〔1〕 周文（一九〇七——一九五二），四川荣经人。当时任延安大众读物社社长。

〔2〕 群众报，即《边区群众报》。它是延安大众读物社一九四〇年三月创办的面向工农群众的报纸。

〔3〕 《大众习作》，是延安大众读物社一九四〇年八月创办的辅导通讯员和初学写作者提高写作能力的刊物。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5页。

致 萧 三*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萧三同志：

诗读过了，很有意思。报纸既不登，就在街头发表好了〔1〕。有暇望来谈。此致

敬礼

原件还你。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九日

注 释

〔1〕 抗战时期延安广泛开展了街头诗运动。诗人们把自己的诗贴在（或写在）大街的土壤上、石头上、树干上……，拿到群众中去朗诵，以接受群众的批评。萧三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 根据手稿刊印。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致刘雪苇^{〔1〕}*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

雪苇同志：

来信及提纲^{〔2〕}收读。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赞成你写这本书。此复。致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十五日

注 释

〔1〕 刘雪苇，当时任延安星期文艺学园副主任。参见本书《致刘雪苇》（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注释〔1〕。

〔2〕 指刘雪苇写的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作者原拟按这个提纲写一本中国新文学史，后来缩写为他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一书的第一章（《新文学的历史说明什么》）。该书于一九四八年五月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3页。

致 萧 军^{〔1〕}*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日）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的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现人我关系，要故意的强制的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 泽 东

八月二日

注 释

〔1〕 萧军（一九〇七——一九八八），辽宁锦县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74—175页。

致 萧 军^{〔1〕}*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二日）

萧军同志：

昨晚未晤罗、舒^{〔2〕}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3〕}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致

敬礼！

毛 泽 东

八月十二日早

注 释

〔1〕 萧军，详见本书《致萧军》（一九四一年八月二日）一文注释〔1〕。

〔2〕 罗、舒，即罗烽、舒群。

罗烽，一九〇九年生，辽宁沈阳人，作家。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舒群，一九一三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作家。一九四〇年起，任鲁艺文学系教员、系主任和《解放日报》四版主编等职。

〔3〕 艾青，一九一〇年生，浙江金华人，诗人。一九四一年到延安。后到鲁艺任教，兼《诗刊》（延安版）主编。

* 根据手稿刊印。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致 欧 阳 山^{〔1〕}*

（一九四二年四月九日）

欧阳山同志：

来信收到。拟面谈一次，如同意，请于今日惠临一叙，并盼与草明^{〔2〕}同志偕来。此致
敬礼！

毛 泽 东

四月九日

注 释

〔1〕 欧阳山，一九〇八年生，湖北江陵人，作家。一九四一年九月起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一九四二年二月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2〕 草明，一九一三年生，广东顺德人，作家。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

* 根据手稿刊印。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致欧阳山、草明^{〔1〕}*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三日）

欧阳山
草明 二同志：

前日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赐示为盼！

毛泽东

四月十三日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94页。在同一天，毛泽东也给萧军、罗烽、艾青等写了同样内容的信。据艾青回忆，在这之前毛泽东写信给他：“有事商量，如有有暇，敬祈惠临一叙。”四月十一日毛泽东与艾青谈了有关文艺方针诸问题。接到四月十三日的信后，艾青将自己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写成文章寄给毛泽东。不日毛来信说：“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艾青对文章进行了修改，五月十五日以《我对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为题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艾又写信给毛，要求到前线去。毛回信说：“来信收到，赞成你去晋西北，但不宜太远，因同蒲路不好过。目前这个阶段希望你呆在延安，学习一下马列，主要是历史唯物论，然后切实研究农村阶级关系，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对中国的战况总是不很明晰的。不知你意如何？此致敬礼！”在信纸的边上又加了一句：“待天晴，我再约你面谈。”可惜的是，艾青保存的毛泽东给他的这些信在“文化大革命”中都遗失了。参见艾青《漫忆四十年前的诗歌运动》（《艾青选集》第三卷，第488—491页）。

注 释

- 〔1〕 欧阳山、草明，详见《致欧阳山》（一九四二年四月九日）一文注释〔1〕、〔2〕。

致欧阳山、草明^{〔1〕}*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

欧阳山同志：
草明

四月十五日来信阅悉，我现在尚不能够对你提出的问题作答复，待研究一下罢。如果你们在搜集材料，那很好，正反两面都盼搜集，最好能给我一个简明的说明书，不知文艺室^{〔2〕}同志有暇为此否？

敬礼！

毛泽东

四月十七日

注 释

〔1〕 欧阳山、草明，详见《致欧阳山》（一九四二年四月九日）一文注释〔1〕、〔2〕。

〔2〕 指一九四一年在延安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所属的文艺研究室。欧阳山当时是该室主任。

* 根据手稿刊印。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

致 罗 烽^{〔1〕}*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

罗烽同志：

你的文章^{〔2〕}读过了，今付还。

我觉得关于高尔基的一篇是好的，这篇使我读后得到很大的益处。但其余的文章，和这一篇的观点不大调和，我虽只看一遍，但觉有些是不明朗化，有些则论点似乎有毛病。我希望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将自己的作品检查一番，对于你的前进是有益的。未知当否，请加考虑为盼！

敬礼！

毛 泽 东

六月十二日

注 释

〔1〕 罗烽，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2〕 指罗烽一九四一年三月到延安后写的几篇文章。其中《高尔基论艺术与思想》一文，发表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延安《文艺月报》第七期上。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95页。

致欧阳山尊、朱丹、成荫^{〔1〕}*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欧阳山尊

朱 丹同志：

成 荫

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2〕}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欧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敬礼！

毛 泽 东

十一月二十三日

注 释

〔1〕 欧阳山尊，一九一四年生，湖南浏阳人。曾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社长。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四月任鲁迅艺术文学院晋西北分院院长。

朱丹（一九一三——一九七八），后改名朱丹西，北京人。当时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副社长。

成荫（一九一七——一九八四），上海松江人。当时任八路军一二〇师政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05—206页。

治部战斗剧社政治指导员。

〔2〕指成荫等创作的反映当时敌后斗争生活的《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虎列拉》、《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等剧。一九四二年冬，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在延安演出过这些剧。

致 郭 沫 若^{〔1〕}*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

郭沫若兄：

收到《虎符》^{〔2〕}，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毛 泽 东

一月九日延安

注 释

〔1〕 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革命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周恩来任副部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2〕 《虎符》，是郭沫若一九四二年二月写的一部历史话剧。剧本取材于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和安釐王的宠姬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借此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从而抨击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和摧残抗敌力量的暴行。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1页。

致杨绍萱^{〔1〕}、齐燕铭^{〔2〕}·

（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3〕}，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 毛泽东看了杨绍萱、齐燕铭编导，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后，写了这封信，请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转交编导者。“文化大革命”期间此信曾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这封信被说成是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被删掉。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了此信的全文。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2—223页。

注 释

〔1〕 杨绍萱(一八九三——一九七一),河北滦县人。当时是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

〔2〕 齐燕铭(一九〇七——一九七八),北京市人。当时在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任科长。

〔3〕 指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了《屈原》、《虎符》等历史话剧。

致 周 扬^①*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

周扬同志：

此篇^②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③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④，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 泽 东

四月二日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8—229页。

注 释

〔1〕 周扬（一九〇八——一九八九），湖南益阳人。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

〔2〕 指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后来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八日延安《解放日报》。《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

〔3〕 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

〔4〕 这是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对蔡特金的一段谈话。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一九五七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一书的汉译本中，这段话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致李鼎铭^[1]*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2]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禱！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0—231页。

注 释

〔1〕 李鼎铭(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2〕 李健侯,陕西米脂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

致胡乔木^{〔1〕}*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乔木：

此文^{〔2〕}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毛泽东

五月二十七日

注 释

〔1〕 胡乔木，一九一二年生，江苏盐城人。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 指艾青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后来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延安《解放日报》。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2页。

致丁玲、欧阳山^{〔1〕}*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

丁玲
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2〕}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注 释

〔1〕 丁玲（一九〇四——一九八六），湖南临澧人，作家。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延安《解放日报》文艺版编辑。

欧阳山，参见本书《致欧阳山》（一九四二年四月九日）一文注释〔1〕。

〔2〕 指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延安《解放日报》。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3—234页。

致郭沫若^{(1)*}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²⁾，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³⁾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⁴⁾，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1—243页。

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于延安。

注 释

〔1〕 郭沫若，参见本书《致郭沫若》（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一文注释〔1〕。

〔2〕 《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一九四四年三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著名史论著作。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3〕 太平军，是洪秀全等建立的农民革命武装，一八五一年一月在广西金田村举行起义，先后转战桂、湘、鄂、赣、皖、苏、浙等十余省，有力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但是，太平军在占领的地方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犯了许多错误。因此，它不能抵抗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于一八六四年遭到失败。此后它的余部又继续奋战了两年多。

〔4〕 《反正前后》，是郭沫若一九二九年写的反映自己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生活经历的作品，一九二九年八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一九五八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第六卷。

致 柳 亚 子^{〔1〕}*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亚子兄：

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敬祝健康！

毛 泽 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注 释

〔1〕 柳亚子（一八八七——一九五八），江苏吴江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一九四一年谴责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4页。

致 沈 雁 冰^{〔1〕}*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雁冰兄：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敬祝健康！

毛 泽 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注 释

〔1〕 沈雁冰（一八九六——一九八一），又名茅盾，浙江桐乡人，文学家。一九四〇年五月曾到延安，并在鲁迅艺术文学院讲学。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5页。

致 萧 三 ^{〔1〕}*

（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萧三同志：

你的《第一步》，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

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2〕}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访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遇此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 泽 东

二月二十二日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58—259页。

注 释

〔1〕 萧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参见本书《致萧三》（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七日）一文注释〔1〕。

〔2〕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贾拓夫，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

谭政，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致 柳 亚 子^{(1)*}

(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日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是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²⁾，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清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颂
兴居安吉！

毛 泽 东

十月四日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1—262页。

注 释

〔1〕 柳亚子，参见本书《致柳亚子》（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文注释〔1〕。

〔2〕 陆游，南宋诗人。

陈亮，南宋思想家、文学家。

致柳亚子^{〔1〕}*

（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亚子先生左右：

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阅报知先生已迁沪，在子再^{〔2〕}追悼会上慷慨陈词，快何如之。印章二方，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3〕}的和词，均拜受了；“心上温馨生感歉，归未絮语告山妻”^{〔4〕}，我也要这样说了。总之是感谢你，相期为国努力。贱恙是神经疲劳，刻已向好，并以奉闻。敬颂

道安

毛 泽 东

一月二十八日

注 释

〔1〕 柳亚子，当时任反对蒋介石独裁卖国政策的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委员。参见本书《致柳亚子》（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文注释〔1〕。

〔2〕 于再，昆明南菁中学教员，一九四五年在昆明学生反对内战、要求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67—268页。

和平的“一二·一”运动中牺牲。

〔3〕 孙女士，即孙荪荃，谭平山夫人，爱国民主人士。

〔4〕 这是柳亚子一九四五年秋写的《毛主席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简恩来、若飞》一诗中的两句。

致毛岸英^{〔1〕}*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岸英儿：

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2〕}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3〕}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注 释

〔1〕 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

〔2〕 永寿，即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

〔3〕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85页。

致 齐 白 石^{〔1〕}*

（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

白石先生：

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毛 泽 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

注 释

〔1〕 齐白石，详见本书《在关于使用模特儿情况来信上的批示》一文注释〔2〕。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8页。

致 廖 静 文^{〔1〕}*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静文同志：

十月间的信和徐先生^{〔2〕}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3〕}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情告知为盼！顺致

敬意

毛 泽 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注 释

〔1〕 廖静文，画家徐悲鸿的夫人。

〔2〕 指徐悲鸿。参见本书《在关于使用模特儿情况来信上的批示》一文注释〔1〕。

〔3〕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73页。此信是毛泽东派田家英送去的，同时毛泽东还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信中说：“田家英同志：请你持此信去访问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看其有无困难，是否需要帮助（政府是否已有帮助），告我为盼！”

致臧克家^{〔1〕}等*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来，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注 释

〔1〕 臧克家，一九〇五年生，山东诸城人，诗人。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20--521页。

致袁水拍^{〔1〕}*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2〕}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3〕}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4〕}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 泽 东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日

注 释

〔1〕 袁水拍(一九一六——一九八二),江苏吴县人,诗人。当时任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和副刊部主任。

〔2〕 《摇头》,是袁水拍写的一首政治讽刺诗,载于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人民日报》。

〔3〕 指陈毅写的《游玉泉山纪实》一诗,载于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人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24—525页。

民日报》。

〔4〕李希凡，一九五三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因写《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受到重视，于一九五五年调到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部任编辑。

致刘少奇*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¹⁾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²⁾，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³⁾于明皇，可见彼此倾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象齐白石⁽⁴⁾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5—536页。

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着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注 释

〔1〕 贺知章，唐代诗人。

〔2〕 这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中的一句。原诗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信中提到的“‘少小离家’一诗”即指这首诗。

〔3〕 李白，唐代诗人。

〔4〕 齐白石，参见本书《在关于使用模特儿情况来信上的批示》一文注释〔2〕。

致 周 恩 来*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总理：

我在郑州看过一次戏，穆桂英挂帅，叫做《破洪州》，颇好，是一个改造过的戏，主角常香玉〔1〕扮穆桂英。我看可以调这个班子来京为人大代表演一次。如你同意，请处理。

《破洪州》剧本仍有缺点，待后可商量修改。

毛 泽 东

四月二十四日

注 释

〔1〕常香玉，一九二三年生，河南巩县人，豫剧表演艺术家。当时任河南豫剧院院长。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7页。

致 陈 毅^{〔1〕}*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来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来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2〕}善七律，董老^{〔3〕}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西 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大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

*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7—609页。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⁴⁾之《北征》，可谓“散陈其事而直言之也”⁽⁵⁾，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⁶⁾，“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⁷⁾。韩愈⁽⁸⁾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宋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⁹⁾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¹⁰⁾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注 释

〔1〕 陈毅（一九〇一——一九七二），四川乐山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他写了很多诗词。一九七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毅诗词选集》。

〔2〕 剑英，即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他写的诗词很多，现在已经出版的有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远望集》和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叶剑英诗词选集》。

〔3〕 指董必武（一八八六——一九七五），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写了很多诗。一九七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董必武诗选》。

〔4〕 杜甫，唐代诗人。

〔5〕 见《诗集传·周南·葛覃》朱熹注。

〔6〕 见《诗集传·周南·蟋蟀》朱熹注。

〔7〕 见《诗集传·周南·关雎》朱熹注。

〔8〕 韩愈，唐代文学家、诗人。

〔9〕 李白，唐代诗人。

〔10〕 李贺，唐代诗人。

致 刘 大 杰^{〔1〕}*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

送上海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先生：

我同意你对韩愈^{〔2〕}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李义山无题诗^{〔3〕}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与论，拜读欣然，不胜感谢。

毛 泽 东

二月十二日

注 释

〔1〕 刘大杰（一九〇四——一九七七），湖南岳阳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2〕 韩愈，见上文注释〔8〕。

〔3〕 李义山，即李商隐，唐代诗人。他的爱情诗多以“无题”命名，颇为后世称道，但对其实际含义，诸家所释不一。

* 在评法批儒中，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于一九七五年八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如何评价韩愈和如何解释李商隐的“无题”诗，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韩愈虽非法家，但也不是醇儒，不能一概否定。毛泽东写了以上复信。根据手稿刊印。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